

【历史文化】

贵州汉族移民史研究述评

周永健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学术界关于贵州移民史之阶段划分颇有争论, 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六次迁移说是主流。关于汉族移民入黔之原因、类型与特点分析, 普遍认为与中央王朝经营贵州之政策走向有关, 一些学者详细分析了历代入黔汉族移民类型、方式及特点, 进而关注汉族移民入黔人口数量、分布等问题。入黔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交往与文化互渗、汉族少数民族化、认同贵州文化等, 是学者比较关注的话题。由此, 一些学者分析汉族移民给贵州带来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诸多积极影响, 以及因此触发的一些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适问题。

关键词: 贵州移民史; 汉族移民; 移民文化; 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39 (2024) 03-0028-08

人口迁移, 系指人类的居住地点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汉族移民入黔, 肇始于汉武帝“开西南夷”, 从明清到当代, 以汉族为主体的移民入黔, 始终持续不断。贵州之人口结构也从明以前的“夷多汉少”, 转变成清代以来的“汉多夷少”。个中缘由与情形, 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梳理贵州汉族移民史学术研究现状, 无疑有利于认真审视进路、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为后续继续推进作一定铺垫与探摸。

一、贵州汉族移民史阶段划分研究

关于贵州汉族移民史的阶段划分问题, 有研究者分为四个阶段, 或者说四次移民潮。他们认为, 明代 80 万军事移民分屯置堡, 此为第一次移民潮。清代经济动因招来客民, 乃第二次移民潮。因为前代移入者已经成为“土著”, 所以称新来者为“客民”。1949 年贵州解放后, 南下西进支黔干部, 既是建立新政权的骨干队伍, 亦因此出现第三次移民潮。1960 年代, 18 万“三线建设”者迁黔, 则为贵州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潮。^[1]

多数学者认为汉族移民入黔, 当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但即使是持“五阶段”说者, 也存在具体划分的历史时间节点的差异。史继忠认为, 汉族移民进入贵州, 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两汉为开端, 汉族人口成批进入贵州, 发端于汉武帝“开西南夷”, 唐宋时期稍有发展, 明代则是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贵州; 到了清代, 汉族人口比重已占贵州总人口之多数; 辛亥以后, 汉族移民入黔的规律又出现新的变化。明以前贵州人口格局, 始终是“夷多汉少”, 之前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 也大都少数民族化。明代以降, 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徒入黔, 汉族影响日隆; 清末时期, “汉多夷少”则是贵州人口之族别格局的显著特征。各个时期汉族移入贵州的社会背景不同, 组织方式不同, 产生的后果也不同, 但总的说来, 汉族对贵州的开发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2]古治康亦持五次迁移说, 他认为战国秦汉以来, 一些少数民族先民迁入今贵州地区时, 汉族也从不

收稿日期: 2024-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儒学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研究”(22AMZ015)。

作者简介: 周永健(1973-), 男, 四川南部人,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人类学, 区域历史与文化。

断迁来。汉族移民迁徙入黔，虽有持续推进的长时段历史特征，但总体上可归纳为五次大规模集中迁移。历史时期的每次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徙入黔，都对贵州社会历史的大踏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也就成为贵州社会发展的五次高潮。^[3]

岳文钊认为，贵州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是在两汉时期，有大批汉人举家迁入夜郎，但为数不多，汉文化的扩散也仅局限于很小的区域。又因处于大片土著文化包围之中，随之也因文化交融而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唐宋时期出现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移民来自中原和江南地区，形成了外来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并存局面。明清时期出现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入黔，贵州建省后，中央王朝多次从中原及江南移民到贵州，进行军屯、民屯和商屯，既巩固了移民文化在夜郎地区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促进了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工厂、学校、机关迁到贵州，此为第四次大规模移民入黔，一时间，中华各个区域文化汇集于黔。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大批工矿企业、科研教学单位及建设大军入黔，此为第五次大规模移民入黔。不仅给贵州的多元文化再添新因子，还带动了贵州民族文化现代化。^[4]

李平凡主张六次迁移说。他认为汉代设“初郡”，“募豪民田南夷”开其端，这批从巴蜀应募而来的豪民，成为移居贵州的第一批汉族人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姓及避乱“晋民”之入，为第二次移民入黔。明初，“调北征南”“调北填南”，以及其后或因经商，或因游民，来者日众，此为第三次移民入黔。其中，最多者为江西籍，其次为两湖籍，再次为四川籍。军户主要来自中原和江南，民户主要来自四川、湖广等邻省及中原各地。清代汉族移民入黔为第四次，经明末清初长年战乱后，贵州人口大量散逃，田土荒芜，赋税剧减，招民垦荒成为官府的紧迫任务。清代“改土归流”，封建领主制的瓦解、卫所屯田国有制的废除，为外省流民移居贵州铲除了制度性障碍。民国时期，贵州汉族人口迁徙，主要出现在红军转战贵州、抗日战争两个阶段，此为第五次移民入黔。抗日战争时期，汉族移民入黔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随企业、学校等单位有组织、有计划地团体的业缘转移；一是以家庭、以乡亲结伴自发式、分散式的血缘、地缘性地逃难。抗战期间入黔之汉族移民就地域而言，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内迁者皆为文化知识型、技术型、经营管理型人员，难民基本上属于城镇人口，入黔后主要聚集于省会贵阳及安顺、遵义等城市及其附近。除一些工厂、学校外，很少散落于农村。抗战胜利后，便返乡而去，很少有留居贵州者。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口移居贵州为第六次大移民，还可再分为三个时期。一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干部配置；二为大批科技人员和职工调入贵州进行“三线”建设；三为改革开放以来汉族人口频繁大量迁徙入黔谋职，经商，打工者。这批移民包括：（1）人才交流中的流动，人才可分为知识型、科技型和管理型三大类。（2）农民工的流动。（3）入黔经营工商。^[5]

上述有关移民入黔的研究，之所以出现历史阶段划分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四次移民潮”持论者着眼点在于移民数量的大小上，所以将明代之前“夷多汉少”阶段的小规模移民不纳入考察。“六阶段”说者则增添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大姓及避乱“晋民”入黔的研究，其余阶段则与五阶段说者无甚差异。

二、汉族移民入黔之原因、类型与特点分析

有学者认为，汉族移民入黔潮流之显与微，与中央王朝经营贵州之政策走向高度相关。而移民类型与特点，则随中央王朝经略贵州之侧重点不同也有所变动。如罗康隆认为，明清两代王朝经营贵州目标不同，因而汉移民特点各有表征。明代在贵州设防驻军，意在护卫从湖南经过贵州直达云南的驿道，即是明人所谓“一线路”，以防止元蒙残部从河西走廊西段和青藏高原东部偷袭云南。因沿路密集驻军需要解决军需与财政而设贵州省。因此，明廷经营贵州侧重点是设防，而非增加财税或弹压对抗明廷的军事力量，中央王朝的基本

手法一是紧缩开支，二是增加汉移民以提高财税收入。总体而言，明代汉族移民入黔，是以军户移民为主，清代则变成以民户定居于黔为主。明代移民以国家调遣差派为主，清代则以汉族移民个体自由迁徙入黔为主。此外，明代汉族移民入黔之规模虽远超前代，却无法与清代之规模相提并论。具体而言，明代迁徙入黔之汉族移民定居点，主要分布在卫所、主要交通沿线；但清代之汉族移民则深入黔省各地之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呈现出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此外，明清两代汉族移民入黔的不同特征，也可从汉族与土著民族关系印证，也即中央王朝与土司关系、汉族移民与土司关系、少数民族群众与中央王朝关系、少数民族群众与汉移民群众关系是分析的重要视角。^[6]

郑姝霞认为，13世纪以前中央王朝对经营贵州不甚重视，因而汉族移民入黔规模极为有限，且入黔之汉族移民多被土著民族同化。13世纪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央王朝重视经营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汉族人口随即大规模迁徙入黔，并同贵州土著民族一起开发贵州。这期间的移民类型包括军屯、商屯、灾民逃荒、自然迁移，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迁移入黔的情况。由于明清中央王朝经营贵州追求目标不同，汉族移民入黔的政策机制也就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移民趋势与特点。具体而言，明代入黔之汉族移民主要是军户，经由中央王朝调动而来；清代则是移入定居、从事产业之汉族为主，主要是基于移民之个人诉求而来。^[7]

冉光芬据人口流动情形，将明代入黔移民分为九种类型，包括屯戍的正军、舍丁及军余、与土著女性结婚而定居之军吏、受鼓动入黔之军兵戚友、手工业者、商人、仕宦在黔者、罪谪之官吏、避祸潜入者。很明显，上述划分与归类是基于汉族移民性质、入黔方式与途径确定的；名为九种，其实可以简约处理，整合归并为军事移民、商业移民、政治移民、自发流徙民四类型即可。^[8]

一些学者对黔省各地移民情况进行研究，其切入点同样关注移民原因、方式、类型等。如石春艳比较研究明清时代黔西毕节一带的移民问题，认为明代毕节地区汉族移民类型包括卫所移民、自由移民两种类型。第一批军事移民随吴三桂征伐南明永历政权而进入贵州，以北方汉族群体为主。自由迁徙入毕节地区的移民，主要是周边川滇诸省之灾民、破产商人、手工业者，客久成籍，成为方志所载之“客民”。这些客民或租种、购买土著民族土地而成为农业移民，或者从事工商业谋生，或受雇于他人凭力气谋生的佣工；第三类客民是多以商业活动为主，又购买土著民族之田产，却又不愿落籍的汉族移民。

由此，石春艳继续研究明清时期毕节地区汉族移民的活动特征。明代因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而来毕节地区的汉族移民，屯戍结合，守望相连，形成独特的屯堡汉族社区。但卫所、屯堡驻点又与毕节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村寨交错，形成夷汉杂居的居住格局。明朝中后期，因战争引起社会动荡，卫所制度废弛，屯军出现流散，主官开始以所占田亩招徕毕节之土著租种，因而出现汉夷民族杂居于同一村落的新格局。清代之毕节地区的汉族移民分布与流动，更多的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而迁移，居处主要以之为准绳。^[9]

李丹丹认为，明初进入黔西南的汉族移民因设立卫所、屯田而来，移民为屯驻之军人、屯垦之家属，以及官方特许之商人，集中分布在交通干线、城镇。明中后期，自发性汉族移民进入黔西南地区，以开垦较为平坦地区的土地为主，也有从事工商业者，但整个明代移民对黔西南社会的影响较弱。清代由于大批汉族移民涌入，黔西南社会发展进程加快；汉族移民与土著之间，因资源日益紧张而产生矛盾冲突。^[10]

聂开吉认为，明初汉族移民入黔类型，包括卫所移民、民籍移民、商屯移民、仕宦谪迁移民四种。就黔东南而言，汉族移民人数最多，且卫所移民影响最为深远。明政府在黔东南及以西地区因设立卫所而实行屯田，以保障屯军的粮食供给，因此，明初黔东南移民具有单一性，以卫所汉族移民为主，自由移民为辅；移民数量庞大，军户居多，形成了共同经济生活下的共同心理素质。该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及文化教育活动，商业活动主要依靠商屯，招募内地盐商到黔东南地区就地“开中”。因推广儒学，

汉族移民担当了“广教化，变土俗”的角色任务。^[11]

蒙爱军、罗万雄整合文献，选取移民性质角度，分析移民类型、阶段，认为自明代以来有8次移民入黔，移民类型亦为8种，包括军事移民、思想移民、商业移民、政治移民、工业移民、文化移民、经济移民、科技移民。研究者认为8次移民，按下了贵州后来居上的快进键。具体而言，军事移民，指明初25万余人屯戍戍边到贵州安顺一带。思想移民，指1935年途经贵州的数万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参加红军的数万贵州民众。商业移民，指1944—1946年，50万难民分别定居于独山，都匀、福泉、贵定、贵阳及公路沿线的农村。政治移民，指1949年贵州解放，大批南下西进干部到贵州建立政权。工业移民，指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20万有知识、有技术的产业大军入黔。文化移民，指1968年1万余知识青年从上海到贵州农村上山下乡，120余万知识青年从贵阳及各地市州城市、学校、厂矿回乡劳动。经济移民，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国家大项目建设、大资金投入，推动贵州发展，人口大流动。科技移民，即自2007年以来，贵州进入科技移民的大数据产业发展阶段。^[12]将移民史之历史性以移民性质解释，此种切割是否合理，涵盖力如何，能否合理解说上述8种移民类型之交叉性，值得商榷。

关于汉族移民入黔人口数量的研究，蒋德学认为，屯军是汉族进入贵州的重要形式，明代贵州屯军多属谪戍而来，更主要的是清代屯军。贵州邻省汉族灾民逃荒进入贵州，是移民的第二种形式。外省破产商人、手艺人、农民移民贵州，是汉族移民入黔的第三种形式。该学者认为汉族人口大量移入贵州始于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康熙以前，贵州人口仍然是少数民族占优势。雍正年间以后，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贵州，政治因素是清王朝镇压土著少数民族反抗后，贵州人口减少，需要移民屯垦。从经济上看，雍正、乾隆以后，贵州水陆交通有了较大发展，各民族相互交往成为可能；贵州农业、工商业的较大发展，亦为中原和邻省客民进入贵州提供了物质基础。^[13]

杨军昌基于文献进行人口数量的量化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认为13世纪以前，入黔之汉族移民数量不多，迁入者也逐渐融入黔省之土著民族中，少数民族始终占人口之绝对多数。明代以降，无论是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还是清初因征伐云南而入黔之大军，以及基于经济、灾荒等因素而入黔之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贵州境内，汉族人口比例增长较快。但直到清初，贵州人口格局依然是少数民族“十居六七”。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随着更多的汉族移民迁徙入黔，开始出现“汉多夷少”的格局。民国以来，更多的汉族移民因各种原因而大量进入贵州，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汉族人口占比达到70%。新中国成立后，入黔之汉族移民，以经济型移民为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批建设移民进入黔省。^[14]

三、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交往与文化互渗研究

黄万机认为，洪武年间，皖、赣、湘及巴蜀诸省之数以百万计的汉族移民进入贵州，汉族文化充分发展，黔地走出一批声名卓著的土著文化名流。汉族文化大家中，有不少人关心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如王阳明、贺长龄、郑珍等；贵州少数民族中的社会精英，不乏倾慕汉文化者，如宋代的冉氏兄弟、元代的杨汉英、明代的宋氏兄弟，以及清代安吉士、安淦辛父子，莫与俦、莫友芝、莫庭芝父子等。夷汉诸族之文化交流碰撞，共同哺育了黔文化的形成。^[15]

至于早期汉族移民“夷化”之原因，冉光芬认为，早期入黔之汉族移民规模较小，且缺乏中央王朝政策安排，被包围于土著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圈中，出现“汉人夷化”也就在所难免了。明代以降，入黔之汉族移民中的有识之士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传播儒家文化，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带来的儒家文化其实也在发生变迁，深受迁入地之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明代以降，随着社会历史环境大重大变化，入黔之汉族移民“夷化”现象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显明了。^[18]

有学者认为,汉族少数民族化,在贵州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习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以此获得当地民族的承认与接纳,成为其“族类”。“历年久远,户口日盈”,达到了“与苗民彼此无猜”的程度。当然,汉族移民在融入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会有所变通。如贵州各少数民族村寨曾经盛行巫文化,迁徙入黔的汉族不得不借鉴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但在“用鬼”时采用了成本较低的鸡、鸭、猪等,而非少数民族巫师禳灾祈福用牛、马大牲畜奉祀。文献所载宋家苗、龙家苗、蔡家苗、洪州苗、车寨苗、阳洞罗汉苗等,多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群体,并不是本地的“苗”。^[16]古永继亦认为,战国时因被楚国放逐而进入贵州的宋家、龙家、蔡家,以及唐代因入守播州而从太原迁徙入黔的杨氏家族及其后裔,逐渐被视为“苗夷”。^[17]

明朝初年,生长于江南地区的顾成,奉召入黔平定“苗乱”,出征云南。因战功赫赫而多次受封,其后裔因此而世代戍守贵州,顾氏移民集团因此成为开发贵州的先锋。但顾氏后裔之一支进入黔东南苗侗地区后,逐渐少数民族化。顾氏家族因此而分衍为汉苗两支系。明清以来,汉苗两支顾氏宗族共同发展,一方面继承了中原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汉苗民族文化的融合。^①

钱理群认为,汉族移民及其后裔长期居住在贵州,接受了贵州文化,对祖籍文化的记忆逐渐淡化与稀释。移民带着原籍文化参与贵州文化建设,更加促成了贵州文化的包容性。它将中国各地方文化融为一体,既包含了各地区的文化因子,但又发生了变异,并相互渗透,形成了与贵州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多元会合型”的文化。贵州文化因此具有接纳多质文化的开放性,以及相应的弹性结构,这是贵州文化得以不断发展与更新的有利条件。^[18]张晓松认为,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与贵州土著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彼此尊重、和平共处,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逐渐合成了贵州地域文化之“千岛文化”特征。因此,不能轻易地视某一文化为贵州文化的代表者。^[19]明代入黔的移民诗人,主要有流寓、贬谪及宦宦三种类型,其诗歌创作具有贵州地域特征:一是多以贵州奇山异水、民族风物、烟雨瘴疠等为写作对象;二是诗歌的情感流变,反映出移民诗人从冲突到顺应的自我调适过程;三是以“变夷”为己任,宣传儒家文化。^[20]

当然,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有时候也会出现阻碍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问题。例如,冉光芬、吴夏平根据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省墓志选集》所录詹氏家族等墓志,研究明代贵州各类汉族移民之间的生态关系。他们因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认同,易于联结,形成较为强大的博弈力量。入黔汉族移民之间的联动,巩固了基于儒家文化而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但这样的“自闭”姿态,多少会阻滞各民族文化之交流互鉴。^[21]

四、汉族移民对贵州社会的影响研究

关于汉族移民对贵州发展的影响,多数学者采用综合论述的方法,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例如,范同寿认为汉武帝“募豪民,田南夷”,应募入黔的豪民大多是川西、川南汉族,带着依附的劳动者,成群进入贵州,在郡县治所附近屯垦,成了郡县有力的经济支柱,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相应增强,许多人最终发展成贵州境内的大姓。东汉晚期,这些大姓势力仿效豪强的做法,走上以武力独踞一方,称王称霸的道路。^[22]

史继忠认为,明初以后,近百万汉族移民入黔,既是巨大的开发力量,也是一次文化大搬迁。其他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及作物种子被带到贵州,促进了贵州的农业开发。军屯之卫、民屯聚居之府州县治所,成为日后贵州城镇兴起的基础。随军而来的匠户,招收土著居民中的徒弟,提升了贵州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地区的开发水平。^[23]

古永继认为，元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入黔，使当地民族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总体而言，外地移民入黔并与土著人民交往，使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加强与中原的联系，各民族融合发展，进而出现明清数百年间贵州经济迅速发展，不断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17]有学者认为，早期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冶铁技术、生产工具制造技艺，使铁器生产与使用在贵州广泛推广，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发展，使贵州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抗日战争以来，省外大批工商企业、机关、学校迁入贵州，带来了大量资金、设备、科学技术和文化，促进了贵州各方面事业的大发展。“三线建设”时期，促进了六盘水矿区开发、国防科工建设，以及贵州冶金、电力、铁路、公路运输等建设和大发展。^[24]戴永明等人认为，明代以来，大量移民入黔，不同文化汇聚贵州，形成了多元共存、共生共荣的贵州文化。清朝“客民”为贵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吴楚之族勃兴黔文化。18万“三线”建设者，推动贵州迎来了工业建设高潮。^[25]

关于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引发的贵州土著民族文化变迁问题，吕善长、张明认为，明代贵州军事移民数量最多，影响也最深远。首先是改变了黔省之人口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长足进展；文教兴盛，风气日开，各民族交流加强，土著民族之风习，渐同中华。^[26]廖荣谦认为，明朝政府出于防守云南和开发边疆的目的，通过军事移民、政治移民和商业移民三种方式，使得大量中原汉族移民迁徙贵州。各省入黔之汉族移民带来属籍之强势地域文化，并与土著文化碰撞、融合，贵州之人文生态得以系统性建构。改变了贵州的人口构成成分，改变了贵州落后的经济结构，加速了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促进了当地风俗习惯的变迁。^[27]

一些学者特别研究了汉族移民给贵州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李景寿认为，明清时期移民对贵州农业开发的影响，以水稻品种的激增为标志，生产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首先得到了开发；又以玉米等域外农作物及本土杂粮的推广为标志，山区渐次得到了开发。^[28]牛耕等相关稻作技术的传入，不仅改变了贵州“火耕水耨”的稻作方式，而且稻作品种的改良，稻作范围明显扩大。^[29]胡清芳认为，自明代以来，移民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贵州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晚清时期，贵州农业生产水平和中原地区已不相上下，甚至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实现了水稻的一年三熟。因此，移民对于贵州农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0]谢廷秋认为，明代移民及后来的两次人口猛增，促进了贵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体表现为卫所军事移民，促进了贵州城镇建设的兴起；又因土地大量开垦而扩大了耕地面积；耕作技术改进和经济作物新品种引进，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为贵州的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开展辟了新途径。^[31]

一些学者探讨了移民对区域社会影响，石春艳认为，明代大规模汉族移民涌入今毕节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以及充足的劳动力，有力地推动了毕节地区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改变了其落后面貌，使毕节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打破了民族隔绝状态，推动和加速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促进了城镇的兴起与商业的发展。^[32]

有关特定迁出地移民群体对贵州社会的影响之研究，庞思纯、徐华健认为，明清以来，赣籍入黔官员、移民、江右商帮、会馆以及赣籍移民后裔，对贵州乃至国家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教振兴等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明清开发贵州的历史过程中，贵州与江西血脉相通，密不可分。^[33]李婧认为，明代，进入思南府的川、陕、赣籍汉族移民，带动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34]

也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移民大量涌入，产生的负面影响。廖荣谦认为，汉族移民挤占原住民生存空间，造成严重的阶级对立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起义。^[27]池家西认为，清代前期外来移民的进入和对贵州的开发，也带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断扩大山区农业垦殖，造成了森林破坏、植被衰退，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形成恶性循环。由于文化隔阂，以及生产方式、经济水平等存在很大差异，导

致一些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增加了苗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经济开发难以正常稳定地进行。^[35]

当然,也有学者关注了“客民”与土著冲突与调适情形。古永继认为,元明清时期,大量汉族移民入黔产生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因为少数掌握权力资源的汉族移民,过多占夺土著居民生产生活资源,引发阶级矛盾乃至民族矛盾。^[17]袁轶峰探讨了清代黔西南客民由“化外之民”到“化内之民”转变的内在规律,并指出在汉族移民“反客为主”的身份转换中,因中央王朝权力的介入而导致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36]郝彧认为,进入水西彝族地区的汉族移民,颠覆了当地原有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引发资源争夺,产生社会矛盾。但实质是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的权力博弈,其调适过程中,儒学传播与推广,恰恰起到了积极作用。^[37]

五、研究趋势

近年来,移民史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且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领域,历史学重在描述历史移民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发展的过程,社会学重在揭示移民后裔聚居区之民间社会组织的功能,人类学则重在研究移民社区中诸多仪式的文化内涵,必须多方面考虑综合的知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使研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度。汉族移民史研究须突破既有的馆藏资料视野,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寻访保存于民间乡土社会的汉族谱牒文献。由于贵州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迥异于其他省域,尤其是多民族同处一片空间的现实,汉族移民与地方社会变迁的互动必然具有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如何以实证研究来加以说明,需要多学科的视野与研究方法运用。通过实证与文献研究,探讨贵州汉族移民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汉族移民群体与地方社会、国家发展的关系,由此透视贵州汉族移民在政治更替、地方治乱、权力转移、商业化、城镇发展、人口流动与族群文化互动等历史场景中的种种姿态,以及在上述历史场景中汉族移民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可以窥见历史场景中的汉族移民现象,还可以通过变化多样的移民形态去透视地方社会的历史面相。从汉族移民入黔史视角,厘清主流文化借助国家政权力量进入贵州地方社会,并努力用大一统的原则形塑黔省文化脉络,对于理解、认识贵州社会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 ① 关于顾氏家族分衍为汉苗两支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韩蕾蕾:《顾氏移民宗族与明代贵州开发和民族融合》,《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48-53页;黎小龙:《从<炉山顾氏族谱>看明代东南移民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融合》,见《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8-237页。

参考文献:

- [1] 本刊编辑部. 贵州历史上四次移民潮[J]. 当代贵州, 2005(7): 24-25.
- [2] 史继忠. 贵州汉族移民考[J]. 贵州文史丛刊, 1990(1): 26-33.
- [3] 古治康. 论汉族移民在贵州开发中的作用[J]. 贵州民族研究, 1994(1): 30-36.
- [4] 岳文钊. 贵州多元文化形成初探——简析历史上的五次移民对贵州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1): 66-68.
- [5] 李平凡, 颜勇. 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 上[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61-124.
- [6] 罗康隆. 明清两代贵州汉族移民特点的对比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1993(3): 104-108.
- [7] 郑姝霞. 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研究[J]. 黑龙江史志, 2009(2): 35-36.
- [8] 冉光芬. 明代贵州历史移民与家庭伦理变迁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43.

- [9] 石春艳. 明清时期贵州毕节地区汉族移民的类型及活动特征[J]. 毕节学院学报, 2012 (6): 90-94.
- [10] 李丹丹. 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与地方开发[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9: 19-22.
- [11] 聂开吉. 明初黔东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及其影响[J]. 安顺学院学报, 2020 (1): 1-9.
- [12] 蒙爱军, 罗万雄. 移民文化与贵州跨越[N]. 贵州日报, 2018-09-04 (10).
- [13] 蒋德学. 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J]. 人口研究, 1983 (5): 35-40.
- [14] 杨军昌. 贵州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动历程与分析[J].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 2016 (Z1): 3-17.
- [15] 黄万机. 汉族文人与贵州文化开发[J]. 贵州民族研究, 1993 (2): 26-36.
- [16] 严奇岩. 贵州民族史论集[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9: 285-288.
- [17] 古永继. 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J]. 贵州民族研究, 2003 (1): 135-141.
- [18] 钱理群, 戴明贤, 封孝伦. 贵州读本[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3: 251.
- [19] 张晓松. 符号与仪式 贵州山地文明图典: 上·序 I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2.
- [20] 吴夏平. 明代贵州移民诗人与地域诗风考论[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3 (3): 36-43.
- [21] 冉光芬, 吴夏平. 明代贵州汉族移民生态及其对家庭伦理变迁的影响——以詹氏家族墓志为例[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1 (5): 47-50.
- [22] 范同寿. 贵州历史笔记[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77-80.
- [23] 史继忠. 移民大潮推动贵州开发[J]. 当代贵州, 2011 (12): 61.
- [24] 杨宗贵. 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 贵州卷[M]. 上海: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4: 161-177.
- [25] 戴永明, 朱韬, 邱春, 等. 贵州: 移民之州六百年[N]. 贵州民族报, 2010-03-26 (A04).
- [26] 吕善长, 张明. 明代贵州的移民及影响[J]. 凯里学院学报, 2014 (4): 87-90.
- [27] 廖荣谦. 明代贵州汉族移民及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文生态建构的影响[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8 (9): 78-84.
- [28] 李景寿. 移民与明清时期贵州的农业开发[J]. 农业考古, 2014 (4): 16-20.
- [29] 李景寿. 明清时期移民与贵州水稻种植的推广[J]. 中国农史, 2014 (5): 50-55.
- [30] 胡清芳. 移民与晚清时期的贵州农业发展[J]. 大众投资指南, 2018 (11): 242, 244.
- [31] 谢廷秋. 文化孤岛与文化千岛: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152-153.
- [32] 石春艳. 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在贵州毕节地区经济开发中的作用[J]. 毕节学院学报, 2011 (9): 75-80.
- [33] 庞思纯, 徐华健. 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1.
- [34] 李婧. 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贵州思南府的社会发展[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32.
- [35] 池家西. 清代前期外来移民对贵州经济的开发和影响[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2 (6): 16-19.
- [36] 袁轶峰. 反客为主: 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69.
- [37] 郝彧. 元明清时期贵州彝族与移民的冲突与调适[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 (4): 199-204.

(下转 52 页)

- ② 巴岱：湘西苗族祭司的苗语称呼，分为巴岱雄（苗祭司）与巴岱扎（汉祭司）。
- ③ 也有不同地区的巴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放在门口的两捆竹片是主家做保财、喜法事仪式上留下来的道具，放在门上是表达不让财、喜“外漏”之意。这很可能是仪式性质发生演变导致的。

参考文献：

- [1] 凌纯声，芮逸夫.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2] 石启贵.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 石启贵. 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 麻树兰，石建中，译注.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4]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23：114.

Name Meaning and Ritual Nature of the Miao Sacrifice "bulqodntadlis"

Wu Xiaodo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angshan District 100102,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Miao people in the eastern dialect area of the Miao language have a sacrificial ritual called "bulqodntadlis", which is divided into day and night. "bulqod" refers to the act of chopping down a thorny qod tree in a ritua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tadlis", that is, to untie curses and spells. This ritual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other type of sacrificial ritual that also has a distinction between day and night, known as "Ba Li", and is a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ame ritual. Whether it is the ritual behavior or the purpose of sacrifice, "bulqodntadlis" has had great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various places.

Key words: Miao ritual, bulqodntadlis, Ba Dai, Ba Li, Xielingjia, playing a dry gong

(责任编辑 车越川)

(上接 35 页)

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Han Ethnic Immigration in Guizhou

Zhou Yongjia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ozhou,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lot of debate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bout the stage division of Guizhou's immigration history. The four-stage theory, the five-stage theory and the six-migration theory are the mainstream. As for the reason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an immigrants into Guizhou,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t is related to the policy trend of the Central Dynasty to run Guizhou. Some scholars hav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types, way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an immigrants into Guizhou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and th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Han immigrants into Guizhou. Th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Han immigrants and indigenous ethnic groups in Guizhou, ethnic minorities of Ha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Guizhou culture are the topics that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e many positive impacts that Han immigrants have brought to Guizhou in terms of culture, politics, economy,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as the conflicts and adjustments between ethnic groups that have been triggered as a result.

Key words: history of Guizhou immigration, Han immigrants, immigration culture, cultur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车越川)